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

王先俊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一项应急之策,更是当时确立的国家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不仅使我们克服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纯洁了党的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这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则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增产节约;反浪费;运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110—07

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一项应急之策,更是当时确立的国家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克服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保证了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纯洁了党的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回顾这一历史,总结其经验,可以为我们更好地推动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作为一场运动,主要集中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这段时间。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和对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

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1]139}会议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情况,列举了一些地方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2]513}12月1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合为一体”、同时进行。1952年10月随着“三反”运动的结束,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至年底也暂告一个段落。本次运动的开展,看上去是直接由朝鲜战事而起的,实际上并非仅仅于此,它还有更深刻的思想和现实背景。

【收稿日期】2013-08-13

【作者简介】王先俊(1962—),男,安徽霍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3]1428,1429}9月3日,毛泽东在“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的指示电中又强调,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4]563}同年12月,周恩来也指出“不抓生产是不行的”,“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想办法进行“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5]4-7}当时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也说道,我们务必“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6]18}“后方的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应该尽可能进行生产,以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蔬菜,没有直接战斗任务的部队,在可能条件下,要进行农工业生产。一切可能节省的支出,要统统加以节省。”^{[6]35-36}“提倡节约,减少办公杂支等费用……此着很重要,数量虽不大,但可转移风气。”^{[6]54}他还强调,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厉行节约。所有机关和公立学校,必须规定工作人员的数量及每个人员的工作任务。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6]65}刘少奇则从实现国家工业化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论述了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重要性。他指出:要让人民真正过上“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中国一定要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用一切办法在现有基础和现有水平上来提高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节省原料和材料,消灭浪费,降低生产品的成本,然后逐步地提高生产技术,建设新的生产事业,并使手工业和个

体农业生产经过集体化的道路改造成为具有近代机器设备的大生产。这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7]2-3}他还说“发展中国经济,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怎样才能筹措这些资金呢?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筹集资金的方法,除了无情地剥削本国工人和农民,并使无数的小生产者和中等企业破产,以集中资本外,“照斯大林同志说,还有以下三种方法:依靠对于殖民地的掠夺,依靠军事赔款,依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让。但是,这些办法,我们都是不能采取的。”我们筹集资金“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个办法。除开这个办法,我们就不能筹集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来满足剥削者奢侈的生活,更不是用来满足政府办事人员的腐化生活,而主要的是用来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我们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以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7]5-7}中央的文件也强调: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8]475}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建国前后的这些论述,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高度重视,又为此后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生产、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说到底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以及所存在的浪费现象。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9]57}许多新解放城市承受着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经济震荡,不仅财政金融秩序非常混乱,而且国家财政收支存在很大的缺口。在支出方面,一是中央人民政府为维持解放全国大陆的后期作战,开支依然巨大,1950年除去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外,军事费用仍占整个预算的38.8%。^{[10]59}二是接管城市对国民党留下的旧人员采取完全“包下来”的政策,“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给中央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全国的公教人员“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虽然周恩来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5]3-4}但是给国家财政经济所带来的压力

则是不争的事实。三是恢复生产投资、赈灾救济等巨额支出。长期战争对于工业、农业、铁路等的破坏极其严重,其破坏程度与抗战前相比,有些地区达到50%以上,加上连年水、旱等灾害,如果不增加一些投入,“国民经济是不易加以恢复的”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挤出一些钱来,用在恢复生产上。”^{[10]60}同时,1949年至1951年,全国灾情不断。1949年1-7月,我国东部遭受旱灾,华东、中南、华北、东北4大区域农田受灾面积217.4万公顷,受灾人口799万。6-9月,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省大面积发生三化螟虫害。7-8月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发生水灾,受灾面积852.46万公顷,成灾人口4555万。1950年的灾情依然严重,主要是虫、冻、雹、旱、水灾,全年除西南地区外,受灾农田1063.6万公顷,成灾人口3384万,造成1951年春荒人口2093万。1951年虽然灾情有所缓解,但旱灾、水灾严重,全国成灾人口达3034万,并造成1952年春荒人口2388万。^[11]另一方面,当时城市失业问题十分严重,如上海就有失业人员42.3万,江苏省城市失业人员72万,成都市失业无业人员占全市人口的28.24%。^[12]据统计,当时失业人员约为400万人,从未就业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则人数更多。^[13]做好赈灾和失业救济工作无疑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在收入方面,总体上是中央财政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而且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是分散的,“公粮、税收均在县、市、省的手里,收入的多寡迟早,中央无法确实掌握”,“只统一支出,未统一收入。”^{[6]48-70}另一方面,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比如有个部门的“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另有二千吨汽油,因工作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有一个纺织机器厂,“政府共投资四千余万元,主要厂房面积达四十五亩,由于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有个省的人民银行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一千多斤苹果和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等。”^{[14]22-23}面对以上情况,再加之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党和政府除进一步加强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外,增产节约和反对

浪费是一个重要而根本的选择。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2]483}

二

虽然在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前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贯穿于1949-1956年这段时间的始终。或者说,当时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前面有一个“序曲”,后面还有一个“延伸”。对此,下面分别予以简要的分析。

前文已经指出,1949年8月3日毛泽东在给上海负责人的指示电中就曾提出“三个着重”,即“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的问题。11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机关中组织开展了“一两米”节约运动,规定各机关工作人员自11月份起至明年2月底止,每人每月节约小米2斤,以救助灾民。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元旦社论,提出195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厉行节约”并“动员全体人民,以最大努力恢复生产”。为了做好节约工作,1950年3月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要求各大行政区、省、市也相应分设编制委员会,加强编制、物资管理。同年10月,全国各级政府机关行政人员整编工作告一段落,政府机关人员比2月减少约1/4左右。^{[15]367}1951年2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为了争取农业丰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必须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老解放区为爱国丰产运动)。3月,中央又发出《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任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支持政府领导农村中全体党员、青年团员和农民群众积极开展全国性的生产运动,以保证1951年全国农林生产任务的彻底完成。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以节约和丰产为中心的爱国运动,有的地方组织工人农民开

展生产竞赛,有的行业组织开展生产技术和方法创新。其中,“纺织能手”郝建秀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她所创造的一套“细纱工作法”,不仅增加了生产,节约了原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为经济核算、任务定额打下了基础,使后来的生产竞赛运动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以上这些做法,从目的看,主要是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经济困难,从实际效果上也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党和政府对“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在具体做法上更没有与党的建设以及转变社会风气联系起来。所以,它只是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的一个“序曲”。

相对意义上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正式启动于1951年10月,11月以后逐渐进入高潮。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社论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下,保证对前方的物资供应,就只有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更重要的是,为了准备今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大量资金,全国人民也必须加倍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5]570}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增产节约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经济建设的主要办法。我们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并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准备条件,就必须在一九五二年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订立爱国公约,组织竞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初步地实现毛主席所号召的‘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在农民中普遍推行爱国公约运动,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产商品粮食,增产工业原料作物和增产外销物资,并推动农村副业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在国营工厂、矿山和交通企业及其他企业方面,必须在增产节约的要求上,改进经营管理,提高设备利用率,完成清理资产,实行经济核算制,为国家积累起更多的财富。”“在城市方面,……各大中城市的政府,必须严格地管制地方建筑工程,掌握地方建筑计划,凡未经批准的或

已停止建筑的工程,均应一律停止进行。”^{[8]479-480}

“中央要求全党在全国、上下、公私、各个部门和各种工作上都贯彻这一方针。”^{[8]476}《决定》还强调,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8]482}将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此后,在中央的推动下,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进入高潮。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29日,中国人民政协发出《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发出“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号召,^{[16]14}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为了加强对运动领导,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谭平山任副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此后又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和组织。2月3日和5月30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的指示》两个文件,又将“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紧密结合起来。7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对增产节约运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定,要求企业在制订增产节约奋斗目标时,必须注意改进经营管理;在组织增产节约和竞赛运动时,应确定具体的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能因担心有剩余职工,而不敢坚决地实行企业改革和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而应将其“包下来”,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14]279-280}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11月2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了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情况。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增产节约总值达31.7亿元,其中增产总值11.6亿元,生产和基本建设降低成本节约13.7亿元,流动资金节约6.4亿元。报告认为,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不够平衡,解放早的地区的企业比

较好,解放晚的地区的企业要差一些,工业企业较好,其他财政部门较差。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加强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推广先进经验,改良生产技术,为今后推行经济核算奠定基础。至此,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基本结束。

不过,“三反”运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工作的停止。实际上,这项工作一直延续着。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薄一波作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积极地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17]57-58}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保证财政部提出的解决国家财政赤字具体方案的实现。1954年1月,全总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进一步开展劳动竞赛的指示》,号召工人阶级开展劳动竞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一年,全国普遍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关于1954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基本情况和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为解决财政收支矛盾,要求增收节支,开展全面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运动。”^{[18]1187}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提出“厉行节约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的方针,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厉行节约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增加生产”,强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应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节约风气,为有效地实现这一任务而奋斗。”^{[19]287}7月6日,李先念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报告从完成1955年国家预算的角度,再次论述了“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贪污的群众运动”,“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贪污”,坚决消灭“目前还存在着的大量浪费现象,逐步形成严格的节约制度”。^{[19]402-403}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号召全国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高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又密切配合,相互帮助,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相结合的方针下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更推进一步;都应该努力提高自

己的业务水平和熟练程度,学习先进经验,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要求各级党委、行政部门、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加强对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领导,进一步掀起“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潮。^{[20]180-181}后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谈到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问题,提出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积极发展生产,“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必须继续提倡节约,克服浪费。”^{[21]65}以上这些,不仅表明党和政府对增产节约与反对浪费认识的提升,而且在实践中也一直不断地开展着不同形式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

三

新中国初期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显现着鲜明的历史特点,也为我们今天思考和实践这项工作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

把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提升到国家建设的经常性政策和基本方针来认识,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这一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一条基本经验。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对“增产节约”方针的基本定位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社论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增产节约”绝不是为了解决临时困难的措施,而是关系国家建设一项极其重要地经常性政策,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持久的群众性运动来推动。^{[15]570}这里已经把“增产节约”视为“国家建设一项极其重要地经常性政策”和“一个持久的群众性运动”。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对“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决定》指出“增产节约”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方针。我们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8]475}《决定》还指出“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

须着重地进行斗争”。^{[8]483}在此,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就不仅仅是因抗美援朝而起的一时的应急之策,相反它已成为带动我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方针。这既是对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关于恢复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思想的坚持,更是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提升。这样,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作为一个“根本方针”便具有了长久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应该坚持这个方针,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应该坚持这个方针。

将增产节约同“三反”运动、整党建党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这一运动的又一个突出特点和又一条基本经验。把增产节约同“三反”运动“合为一体”,直接源于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负责人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以来,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4亿人民币(旧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1]140}毛泽东对这个报告进行了批示,要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坚决地开展“三反”斗争,同时还要求“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开展这项斗争的总体状况。^{[2]513}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把增产节约同“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同步推进。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高度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迎接一九五二年》的社论,强调“在一九五二年,我们应当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土地改革、全国工矿交通企业实现了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发展增产节约运动”,“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因此,目前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一九五二年增产节约计划的实现有决定的意义。必须认真发动群众,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14]6.7}同时,为避免“三反”运动冲击增产节约情况的出现,中央也明确要求各地“进行三反斗争必须切实注意维持生产”。^{[22]34}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强调“‘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

党运动’,‘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14]64}后来,中央又强调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和建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以积极的态度,讨论研究,并认真地进行整党建党工作”。^{[14]201}由上可见,当时中央的总体思路实际上是,以增产节约作为“中心任务”,以“三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党建党作为重要途径和手段,努力实现增产节约同“三反”运动、整党建党的有机结合。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我们国家在1952年底基本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且有力地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注意根据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开展不同内容与方式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斗争,是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这一运动的再一个突出特点和一条基本经验。在增产节约和反对浪费运动开始不久,中央就曾指出“从全国来说,要由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依靠人民,主要是依靠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全国各阶层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从上下来说,要由中央起,层层带头,一直贯彻到区乡组织,实行上下监督,互派检查。从公私来说,要先公后私,公家作了表率,私人的企业、团体和学校,也就难于自外,并且可以经过政治协商机关去进行动员。从部门来说,整编要以军事部门为重点;增产要以财经部门和工人农民组织为重点;政府、党派和团体则进行一般的精简”,“至于节约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则是所有各方面都应该当作一个中心任务来进行。”^{[8]476}接着,中央又强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注意分清和把握不同情况,“凡原料足、销路好的厂矿,应该首先注意增产,并在增产中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凡销路好,但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厂矿,应首先注意节约,从节约原材料中来争取增产”。“在私营企业中,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迅速结合生产与生活,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团结资方,及时转入生产。”同时“亦应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订爱国增产节约计划,组织竞赛,动员劳资双方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14]280-281}中央对反浪费运动的领导也是如此,比如,中央强调“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必须以检查

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项”。^{[14]66}在高等学校则“要求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14]117}对农村和部队,中央也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不同要求。中央还特别注意“浪费”和“贪污”的处理界限,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明确了处理方针、政策界限和具体方式。

当前,全党正在进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增产节约和反浪费运动的历史,总结党和政府领导开展此项运动的经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9]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1]赵朝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灾害救助工作[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5).
- [12]劳动(半月刊),1958(3).
- [13]毛齐华.一年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成就[N].人民日报,1951-05-01.
-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5]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1卷(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8]刘国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1卷(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 [1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滢]

Movement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 Practicing Economy , and Opposing

Waste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WANG Xianjun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Wuhu , Anhui 241002)

Abstract: Increasing production , practicing economy , and opposing waste was both an emergency policy rais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 and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established th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 the whole country carried out a spectacular movement of increasing production , practicing economy , and opposing was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movement not only enabled us to overcome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 guaranteed the smooth conduction of the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 accumulated capital for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 but also forcefully promoted the Party's self-building , purified the style of the Party and the mode of the society.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movement is a precious treasure for our current cour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practicing economy; opposing waste; movement